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

——党史上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始末

□黄云 苏春生

1934年2月,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沙洲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这是党的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是唯一一次在革命战争年代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史称“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为什么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古田会议之后,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在红军各部队逐步确立,红军队伍在几年艰苦斗争中坚强了自己、壮大了自己,政治工作也得到不断加强,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特殊的革命战争形势和其他客观原因,许多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依然落后。如何更好地把红军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普遍地应用于全国红军部队中去”,红军总政治部进行认真研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召集红军各部队举行一次政治工作会议。

为了使会议召开得更加充分,1933年8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决定举行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各部队马上开始搜集材料并准备大会报告;11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又发出《总政治部训令第七号——关于举行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要求各部围绕10个方面中心议题进行针对性的材料搜集,并在《红星》报和方面军、军团与军区报纸上进行了讨论。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完成百万铁的红军发展,以政治工作的武器来加强红军部队。

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的战略口号

1934年2月7日至12日,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央红军各军团、中革军委直属队、湘赣军区、湘鄂赣军区、闽浙赣军区、江西军区、福建军区、闽赣军区、粤赣军区和中央苏区红军学校、

兵站、医院、地方武装等单位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基层政治工作干部代表,参会人员共258人。这次会议,是红军创建以来规模最大的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由王稼祥、贺昌、李弼庭、李卓然、袁国平5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领导。会议在王稼祥致开幕词后,听取、讨论了中共中央代表博古所作关于五中全会总结的报告,王稼祥所作政治工作报告及李卓然的政治工作副报告,朱德、凯丰、陈云、顾作霖、周恩来的演说。

会议再次肯定了政治工作在红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的战略口号,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应采取的措施。

把群众工作原则写入红军政治工作条例

根据议题,此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修订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红军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例是在1930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并于同年10月颁布。随着红军体制编制的不断完善和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原来的条例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实际需要。于是,在此次政工会上,修订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就被提上了日程。

代表们在认真听取大会报告和部分代表的发言后,讨论形成关于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的修订意见,对条例总则部分和主体部分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修改。修订后的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较之前更加全面具体,特别是将群众工作的原则任务写入条例,更符合红军建设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对规范和加强红军政治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周恩来发表题为《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演说

2月12日是大会闭幕日。上午继续组织代表讨论,

下午,周恩来发表了题为《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演说,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在谈到红军目前实行的作战形式时,周恩来强调指出: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而后,王稼祥作大会总结,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致闭幕词。会议肯定了红军建军以来政治工作的成绩,表彰了中央红军第一、三军团政治工作的经验,号召全军“特别要将模范的一、三军团的经验,拿回去在其他兵团、在各军区、分区,在后方各机关的工作中广泛的运用起来”。

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对于克服红军政治工作现实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释放政治工作效能、提高红军战斗力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会议加强政治工作部署,客观上为长征成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涵养了政治储备。从长远来看,会上对于政治工作地位作用的准确定位和相关理论原则、方针政策进行了科学阐释,推动了政治建军方略传承,为深化全党全军正确认识政治工作重大意义,从而在漫长严峻的革命、建设、改革征途中持续不断推动军队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4年6月17日至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时指出:“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回顾党史上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始末,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理解“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一新时代政治工作的新要求,明确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

惊心动魄找粮食

□钟秋梓

康林(1916年5月—1995年7月9日),于都县人。1932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战士、班长、副政治指导员、教导队队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康林是赣南游击队的特务员,曾担任陈毅的警卫员。

1936年5月间,国民党军队企图彻底消灭赣南山区的红军游击队和摧毁这里的红色政权,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清剿”:把山区的老百姓都赶到平川集中起来;对于粮、布、油、盐等特殊物品的买卖,都实行了严密的封锁;成群结队的敌人不断轮番搜山,并经常在一些要道或沟口上设埋伏。山林里几乎到处都有敌人的足迹,逼得游击队有路不能走,有房不能住,白天不能行动,夜晚不能点火,整天分散地蹲在树上的树丛里,连咳嗽也不敢大声咳。

有时,游击队连续好几天只能搞些香菇、竹笋、野菜等煮了当饭吃,有时这样的东西还吃不上。陈毅整天忙碌,他的右大腿负过伤,行动起来很费力,再加上常常好几天吃不到东西,瘦得脸上的颧骨都高高地鼓起来,眼睛也深陷下去了。看着他又累又饿的样子,康林和其他同志心里着实难受。有天晚上,几个人商议了一下,决定设法出去给首长找些粮食来。第二天,就派康林出去完成这个任务。

康林很警惕地一边走一边侦察着,不敢顺着道路走,只能从树林里钻进去又钻出来。直走到快要中午的时候,康林跑出大约已有30里路,才远远发现前面山洼里有两座茅草房子。康林指望在房子里找到吃的东西,就慢慢地摸到房子后面。但还不能贸然下去。康林躲在树背后观察了老半天,还用石块和木棒向房顶上扔了几次,看样子没有什么动静,康林这才很快地跑进靠东边的那座房子里。

这里的老百姓早被敌人赶跑了,屋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康林七手八脚地想赶快找到一些粮食,可是越慌越是找不到,急出了一头大汗。忽然在床底下,他发现了一个瓷罐子,抱出来一看,里面装的是用熟山芋和酒酿做的山芋糍。康林高兴极了,就把它用一个包袱裹好背上一背,又从兜里掏出一块光洋放进罐子里。他正要拿出铅笔给老乡写个字条时,突然听到有动静。康林抬头往窗外一看,哎呀!敌人端着刺刀已经扑到房子跟前了。

怎么办呢?敌人一定是早就发觉康林进来了,埋伏好了抓他的。决不能活着让敌人抓住俘虏,康林就决心拼着一切,勇敢地冲出去。康林知道犹豫一秒钟都要坏事,这房子又没有后门,康林就急忙向前门跑。但跑了几步向门上一看,两把明晃晃的刺刀已经堵住了门口。康林毫不迟疑地猛冲过去,两只手把两把刺刀向上拨一拨,弯着腰从下面一钻就往外跑。敌人着急地上来,一把抓住康林背上的包袱,幸亏包袱是活结绑着的,康林就把扣一拉,刚好把包袱丢在敌人手里,康林却挣脱出来,撒腿就跑。

康林也没顾得上看清敌人有多少个,只听见他们争着那个包着山芋糍的包袱,等到他们向康林开枪的时候,康林已经钻进房子前面的竹园里。出了竹园,康林就从一个崖坎上纵身往下一跳,又穿过一片稻田,飞快地跑进树林里,七转八转地向山上爬去。敌人跟在后面乱打枪,子弹把山上的树木和石头打得“皮开肉绽”咣咣响,就是没打中康林。

康林一口气翻过了两个山头,才算摆脱了敌人。人是跑出来了,但好不容易搞到手的一点口粮也被敌人夺去了。眼见天色已晚,康林想到同志们都在山上眼巴巴地等着自己搞到粮食回去给首长吃,可是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回去呢?康林下定决心要找到粮食,就在树林里过夜,到天亮再继续去找。

第二天,康林的警觉性更高了,尽量不去找村庄或是住户家,就在山坡上、小道旁徘徊瞭望着寻找机会。康林想,只要能等到一个老百姓,就会找到粮食的。

约莫是早上吃过早饭不久的时候,康林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到山里来砍柴。看他穿的衣服和干活的动作,康林断定他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康林就过去一边帮他砍柴,一边和他拉家常:“你是给你家砍柴吗?”

“是的,我家里有妈妈、妹妹靠我卖柴养活呢!”

“你们村子里是不是住着国民党军队?”

“住着的,他们可把老百姓害苦啦……”

男孩说着说着便停下了,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康林。康林看出这孩子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就对他说道:“我是红军。”

他一听康林是红军,脸上马上露出又高兴又惊讶的样子,他过来亲切地拉着康林的手,问长问短地说了很多话,后来康林就提出要他去帮忙买些粮食。

男孩说:“村子里是买不到粮食的,白军管得很严。我家里前天刚换来十多斤米,我去悄悄拿来给你们吃吧!”

康林说:“那你们一家三口吃什么呢?”

男孩笑笑道:“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你们在山里是找不到粮食的。”说完他就叫康林在山上等着,他进村去拿。康林一再劝他少拿几斤,男孩答应了一声,拔脚就跑下山去了。

随后,男孩拿了一小口袋米来,康林接在手心里掂着差不多有十二三斤重。康林说:“你是不是全拿来了?”

男孩笑着说:“我给妈妈、妹妹还留下几顿吃的呢!”看他说话的神情,也许他根本一点也没有留,康林心里顿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拉着这个男孩的手很久也不能放开。

最后康林拿两块光洋给男孩,他死活也不要,说来说去他只收下一块。男孩着急地推着康林说:“你快背着走吧!”

康林回到原来出发的那个地方,已经不见陈毅和部队了。因为在这种环境里,凡是派出去的人没有按时回来,部队就得赶紧转移地方。康林便又通过地方老百姓的关系,几番辗转才找到同志们。

同志们看见康林背着大米回来了,是多么的高兴!陈毅知道了康林去找粮食的经过后,向大家说:“这点粮食是我们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找来的,不能只给我们几个人吃,应该让每一个同志都吃到它。”

(本文根据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的《星火燎原·未刊稿》第5集,康林著《一次找粮食的经过》的内容整理)

中央苏区第一架飞机和第一个机场

□钟同福

1932年3月上旬,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让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受命赶往瑞金城郊的东山山古庙,向正在休养中的毛泽东报告赣州久攻不克的消息,并请毛泽东下山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

毛泽东当即冒雨和项英一起直奔赣州城外,通过他的一系列指挥,终于撤出战斗。毛泽东建议东路军攻打漳州,认为只有下漳州,方能调动敌人,赢得战争,打开局面。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东路军攻打漳州。

1932年4月10日,红军东路军全歼守塘守敌。当天下午,红军乘胜兵分两路进攻龙岩城,一路由龙门正面进攻西门;一路绕道铜钵,从背面攻入北门。防守龙岩城的国民党张贞部独立团多为新兵,缺乏战斗力,一经红军攻击,自行溃逃。红军一举占领龙岩城。

张贞听闻龙岩被攻,不知战况进展如何,急派飞机前往龙岩侦察。飞机飞至龙岩上空,只见城内红旗招展,想降落加油已不可能,只好匆忙飞回漳州。结果,慌中出错,飞错方向,朝同安飞去,挂在朝天岭的大树上。

是役,红军东路军消灭守敌张贞部1个多团,俘敌685名,缴枪900多支。龙岩战斗,红军初试锋芒,旗开得胜。

龙岩之胜,打开了东征漳州的大门。4月11日,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红一军团师长、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龙岩战斗的胜利经验,部署下一步行动。4月14日,负责攻漳的东路军各部按时集结于龙岩,向漳州进发。4月19日拂晓,战斗打响了。红四军的主攻部队在机枪掩护下,以风霜岭、十字岭为主攻目标,向敌人猛烈进攻,至下午3时,战斗胜利结束。此役,红军攻克漳州,共歼敌4个团,俘敌1674人,缴获步枪2331支、机枪9挺、火炮6门、子弹133200发、炮弹4942发、炸弹242枚,飞机一架。这是一次完胜的战役,也是红军攻打中等城市的成功范例。

在这次漳州战役中缴获了两架国民党飞机,红军官兵闻讯纷纷赶来围观,聂荣臻和林彪还特地跟飞机合影。



聂荣臻和林彪与飞机的合影。(资料图片)

看到飞机外观基本完好,红军决定修复为己所用,找来了曾在苏联上过航校的冯达飞当飞行员。当时在漳州的漳州汽车公司工人张国材、陈文川等也参加了修复飞机的工作。红军缴获的那架飞机稍微检修还能使用,另一架确实存在故障,无法使用了。

维修好的飞机很快就开始执行任务,恰逢红军在漳州召开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冯达飞根据命令,趁着试飞之际,驾驶着飞机在会场上空抛撒传单,这架飞机也被命名为“马克思号”。

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提出:“要把飞机开到瑞金去,建立起我们自己的飞行队伍。”消息传到瑞金。据《瑞金

县志》记载,1932年5月,县苏维埃政府动员王田、云集、黄柏、九堡、武阳、桃黄、下肖、黄安、城郊等地群众3000多人在沙子岗修建飞机场。

当时聂荣臻正好要回瑞金汇报战况,就坐着冯达飞驾驶的“马克思号”前往瑞金,在瑞金沙子岗机场降落。这架飞机后来还在福建长汀公园展出过。

由于缺少汽油以及更换的零部件,这架“马克思号”飞机在执行了一段时间任务后终于“寿终正寝”,为了避免它落入国民党手中,红军不得不将其销毁。作为红军中少见的高技术武器,“马克思号”短暂的服役生涯,堪称传奇。

一座烈士墓的故事

□钟秋梓

新中国成立后,原少共国际师政委、上将萧华回到与敌人鏖战的地方,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悼吴高群》一诗:“青年英雄战团村,出奇制胜创奇军。恼羞成怒蒋飞贼,夺我战友吴高群。智勇双全好战将,赤胆忠心为革命。壮烈青春献大业,英雄形象高山鹰。”

吴高群,上犹县营前镇人,少共国际师师长。他的英雄事迹在家乡家喻户晓,然而他牺牲后安葬在哪里?他的墓是什么样?几十年来,他的亲属和家乡无从知晓。

1910年,吴高群出生在上犹县营前镇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十多岁时,在崇义县城当学徒。1926年,他结识了陈赞雍、邓子恢、邓仲春等人,积极投入工会领导的各种斗争活动。当年9月上旬,北伐军占领崇义县城,他随即加入国民革命军,一路战斗到了武汉。1927年,他参加南昌起义,历经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于1928年初在湖南郴州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4月,吴高群与部队上了井冈山。1929年1月,他随红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3年11月,中革军委任命吴高群为少共国际师师长。12月12日,黎川团村战斗,吴高群冒着敌人密集的火网,深入前沿阵地指挥,炮弹不断地在他周围爆炸。傍晚,战斗快要结束时,不甘心失败的敌人派出飞机向红军阵地疯狂轰炸、扫射。当时,吴高群和萧华在

一棵大松树的两侧观察敌人的动静,忽然一颗重型炸弹落在附近爆炸,吴高群的头部和腰部共7处受重伤,鲜血汩汩流出。经简单包扎,是夜,萧华立即命令师部派出一小分队,把吴高群送到设在福建省建宁县黄坊乡芦岭村杨家祠堂的红军医院进行抢救。12月24日晚上8时,吴高群因负伤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23岁。噩耗传到红军总部,总部首长十分悲痛,指示《红星》报专门刊发悼文,赞誉“他是一个最易深造的红军青年指挥员,他为革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先烈之血浇成了革命之花”——1957年,上犹县在营前镇蛛岭山上建设革命烈士陵园,彭德怀元帅亲笔为烈士纪念馆题词。时光流逝,岁月静好,祖国日益繁荣昌盛。然而,几十年来,吴高群的尸骨到底安葬在哪里一直是个谜团。没有想到,机缘巧合,给大家“解谜”的是作家卜谷。

2020年5月20日,卜谷来电询问笔者是否了解吴高群烈士的情况,得知笔者熟悉他的亲属,他很高兴地说道:“我过几天会带福建一些朋友来营前,到时请你带路。”

5月25日下午,卜谷和共青团三明市委书记等一行十多人来到营前镇政府。其时,卜谷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少共国际师》,从4月下旬至5月下旬,一路探访红色遗迹,寻访红军后人。众人随后去探访了吴高群姐姐的孙子张庆魁。

三明市下辖建宁县。吴高群牺牲后,红军总部决定就地安葬吴高群烈士。在当地村民的协助下,找到了位于红军医院附近徐竹坑一处风景秀丽又相对隐秘的山坳。当时,没有棺木入殓,是黄坊乡芦岭村一位妇女杨德音把自己的嫁妆——一副寿材捐给红军部队用于安葬吴高群。战士们则在墓前立了一块木板做成的墓碑。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芦岭村村民为了保护吴高群的墓地,悄悄地把那块木牌收藏起来……随着时间流逝,在不久前,建宁县发现了疑似吴高群烈士墓。

为确定是不是吴高群烈士的墓,三明市来人采集了张庆魁的头发,妥善收藏,拟通过DNA技术对比确认疑似墓地的身份,并取得吴高群家人的授权,准备对该墓开展挖掘、鉴定工作。

2023年6月19日,笔者得悉,在福建方面的重视下,吴高群烈士墓得到确认和修整。

土地革命时期,上犹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湘赣省苏区南部重要屏障,曾是中共河西道委所在地,一度成为河西十几个县的革命斗争的领导指挥中心。2023年8月,少共国际师成立90周年之际,为告慰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讲好苏区革命斗争故事,上犹县政府启动吴高群烈士墓建设工作,确定在营前革命烈士陵园旧址动工建设一座吴高群烈士墓。一个多月后,吴高群烈士墓建成,墓碑上镶嵌着他的头像照片,眼神炯炯有神;墓正对着东南方向——距墓三四里处正是吴高群出生的下湾村。吴高群从下湾村出发,为民族解放事业奉献了青春和生命。

吴高群烈士墓建成后,许多社会各界人员来到墓前缅怀吴高群烈士。